



延陵堂文学论集

吴长庚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延陵堂文学论集 / 吴长庚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4

(鹅湖学术文丛)

ISBN 978-7-80206-564-2

I. 延… II. 吴…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1142 号

鹅湖学术文丛·延陵堂文学论集

著 者: 吴长庚

责任编辑: 茹新平

版式设计: 莘海琴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4

传 真: 010-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460 千字 印 张: 98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564-2

定 价: 280.00 元/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鹅湖学术文丛》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汤一介	李学勤	张立文
	陈 来	姜广辉	蔡仁厚

主 任	柳和生		
副主任	吴长庚		
委 员	郑日金	邹 毅	赖明谷
	吴晓东	揭新华	范安平
	汪继南	谢维营	曹南洋
	张一兵		

主 编	吴长庚		
副主编	谢维营	范安平	
编 委	李未醉	张小丽	苏 敏

总 序

八百年前,为了调和朱陆学术异同,吕祖谦曾邀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朱熹论辩于信州铅山之鹅湖寺,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自由论辩、平等交流的典范,它揭开了朱陆学术异同之争的历史序幕,也引发了近三百年朱子学与江西之学的交流与论争。鹅湖之会又一次深刻自我反思、彼此汇纳吸收的盛会。会议后,朱陆双方对来自对方的批评意见都进行了深刻反思,都作了自我批评,推进了学术的发展。鹅湖之会所展示的学术精神,值得后人借鉴并发扬光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第二届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上饶师专就以派出五人团队、提交七十五万字论文而备受与会学者的关注。会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黄宣民先生等专程到学校考察,双方签订了人才培养及共同创办《朱子学刊》的协议,学校的国学研究之火,很快被点燃起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学校已在专科基础上发展成为拥有约一万二千名全日制学生的地方本科大学,师资结构不断改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以朱子学研究为基础的国学研究已



成为我院学术研究的特色,得到很大发展。这套《鹅湖学术文丛》的编纂,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提出来的。

丛书以“鹅湖”为称,有以下考虑:其一,鹅湖就在上饶辖下之铅山县,历史上的朱陆鹅湖之会即发生在境内之鹅湖寺,鹅湖实涵禅儒二宗,重修的鹅湖书院是我院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实践基地,距上饶师院不过半小时车程;其二,丛书的编纂,旨在弘扬鹅湖之会所展示的学术精神,总结数百年江西理学传承兴衰的经验,正确评价和认识江西理学在中国理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其三,愿以鹅湖学术精神引领我院学科之路,山不辞土石,海不捐细流,交流论辩,汇纳吸收,正是我们学术成长的基本道路。

本丛书一套八册,都是近几年我院学者的心血之作。2005年,我院顺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在随后一年的整改过程中,我们迅速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的基点上。经过几年的积累,朱子学研究所成功申报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成功申报为江西省高校重点学科。学科群体的结合和学科方向的凝练,为我院的学科建设打下了基础,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结合了地方历史文化,逐渐形成明显的学科特色。

以朱子学研究为基础的国学研究,是本丛书内容的核心。吴长庚教授的《延陵堂儒学论集》和《延陵堂文学论集》是他近三十年来发表的儒学及古代文学研究论文的选编。冯会明副教授的《胡居仁与余干之学》,则是近几年江西理学研究的新成果,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胡居仁理学的专著。周茶仙副教授的《朱熹经济思想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角度考察朱熹的经济思想,可为当代经济研究提供借鉴。张小丽博士的《宋代咏史诗研究》以断代古典咏史诗为对象,探讨了诗人的生平经历、时代思潮与中国古典咏史诗美学特征形成的关系。李未醉博士的《中越文化交流论》,较多地考察了传统儒释道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汲军教授的《辛弃疾信州词与信州生活》,则更

多发掘地方历史文献,考察辛弃疾与信州文人集团的交往及其经济生活,从而为其后期词风的形成提出意见。徐润润教授的《现代诗学原理新论》,上篇讨论了一体两翼的诗歌本质论,下篇从批评和鉴赏角度分析了一些作家的个案。

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一扇窗口,展示我院这所地方大学的学者潜心向学的精神和苦心耕耘的成果。书写出来自然希望有人来读,更欢迎有人去评,有人去辨。因为理不辨不明,学不争不精,鹅湖学术精神是始终与论辩结合在一起的。期待学术界批评指正。

柳和生 己丑仲春 于上饶师范学院

目 录

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1
朱熹的文学生涯·····	27
朱熹文学研究之三大著述·····	43
朱熹论文势与风格·····	53
《左传》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	61
论罗隐的诗·····	71
罗隐讽刺诗艺术美小议·····	80
读陆游记梦诗	
——兼论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90
古典诗词中的朦胧意境·····	103
稼轩词意象说·····	112
论稼轩词爱国情感的审美价值·····	126
纪念辛弃疾逝世 800 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136



辛弃疾在上饶·····	140
王阳明江西事功文学与学术·····	147
蒋士铨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初探·····	162
蒋士铨诗歌简论·····	181
心余诗创作阶段考辨·····	196
蒋士铨《藏园九种曲》研究·····	204
《稼轩词新探索》序·····	215
《诗人审美心理论稿》序·····	217
《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序·····	220
《紫阳遗墨》序·····	223
《信州散文选》序·····	225
《信州风物》序·····	228
《中外文化交流与华侨华人研究》序·····	230
《感悟责任》序·····	232
《常耕集》前言·····	234

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 回顾与反思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文化史上,他的学说被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理论基础,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在世界文化史上,他与之前的孔子、之后的清王夫之被作为中国三家,而列入世界十大思想家之列,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学说囊括了中国经学,创造性地完成了宋代理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在理学或经学的盛名之下,自宋以来就极少有人关注他的文学。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代表统治阶级学说理论纲领的程朱理学,也随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朱熹思想学说也同孔子儒家思想学说一样,从圣殿的宝座走向批判与否定。一百年来,朱熹的思想从被打倒、被批判,到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他的文学也逐渐被研究者所关注,现当代学者不再用经学的眼光去看待朱熹的文学,而把他当作宋代的诗人、散文家一样,深入而客观地研究他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朱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得到挖掘肯定;朱熹文学研究的历史功绩,也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本文拟对辛亥革命百年以来朱熹文学的研究作一回顾,试图从百年间儒学及朱熹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找出一些值得



思考的问题,以引起研究者的共同关注。

一、一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阶段与特点

一百年朱熹文学研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宋明理学作为传统儒学的后期发展,很自然伴随着儒学的兴衰而起落;作为统治阶级学说理论纲领的程朱理学研究,更所不等地随着中国政权的两次交替而显示曲折。明王朝的灭亡,儒学的空疏已受到清初思想家的严厉批判。近代社会的到来,西方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起义,内忧外患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局面,封闭的国门被打开,近代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引入,洋务派、维新派都对传统儒学提出了挑战,儒学的落后和保守被更多的进步知识分子所认同。这是我们认识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前提。

百年朱熹文学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11年至1949年为现代研究的开端,1949年至1978年是批判与否定阶段,1979年以后是朱子学全面发展阶段。

(一)现代研究的开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地位发生了动摇。1912年建国伊始,教育总长蔡元培便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孔子儒学从此失去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1915年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创办《青年杂志》,引发青年向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孔子儒学传统文化的猛攻,并将现代西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进化论、实用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介绍到中国,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要求政治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1919年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用近现代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儒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新文化运动的持续发展,推动人们对中国新文化发展道路

的探索,一部分学者用西方文化为参照,来评价中国文化;一部分学者则冷静地对东西方文化作对比研究。30—40年代,在革命根据地,反孔批儒否定传统文化的观念依然占居主流。

这一时期儒学地位的衰落,自然体现在程朱理学的衰落。但朱熹文学思想的研究却有了良好的开端,学者们开始摆脱传统的经学束缚,而试图用现代学术眼光、新的文学观念来考察朱熹的文学。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1919年,傅斯年发表了《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辨〉》,指出,朱熹的《诗集传》包括《诗序辨说》,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诗集传》,更是《诗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2]。

1928—1929年间,周予同出版了专著《朱熹》^[3],全书八章,在研究朱熹之哲学、经学、史学之外,也较全面地研究了文学。其一,他认为,朱熹对于文学之根本观念,“不外于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可称为人生的艺术派,即以文学出发于哲学伦理,而主张美善一致论也”。其二,谓“其修辞方面之意见,则颇自有其廓清之功,……其指斥当时古文派之矫揉造作,殊可发矇也”。其三,认为,朱熹在文学史上之所以尚能取得一地位者,在其说理之文与解经之文^[4]。周予同概括了朱熹《诗经》学之贡献,并提出《诗经》研究的立场问题,如立场于纯粹之文学,则当不论家法,不言学统,惟训释之安而求。“若仍立场于宗教性之经学,则专己守残,为治经者之正轨;而宏意眇指,反成其混淆家法之罪状。”这实际上是反对《诗经》的经学研究,而肯定朱熹接近文学立场的研究。

1938年,郭绍虞发表了《朱熹之文学批评》,以为,宋代道学家之文学批评也至朱子而集其大成,他的思想比以前的道学家是有些进步,而他的文学观却不带古文家的意味,就论文一点来讲,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5]。1944年,开明书局出版了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这是我国最早提供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较为完整构架、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作出富于新意的



探讨和概括的著作”^[6]。朱先生认为,道学家不屑措意文辞,至朱子而略异,朱子论文重义理,论诗重《选》体,论诗家亦首肯《选》学,与江西诗派推重老杜有异。又肯定朱子“《诗集传》推求诗旨,往往突过前人”,“其立论之勇,不易几及也”^[7]。1946年,罗根泽也发表了《朱熹对于文学的批评》,指出朱熹的“道文一贯”论与古文家的韩欧不同,和道学家的周程也不同,当分析清楚,才能理解旨趣,认识他的贡献——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8]。以上论述,尽管还显得粗略,但都已运用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对朱熹的文学思想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二)批判与否定阶段(1949—1978)。这一阶段又可分两个时期:建国17年是沉闷期,文革10年是批判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体政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孔子儒学、朱子理学受批判理所当然。体现在学术研究上,照搬“老大哥”苏联的经验,对欧美传统存在偏见,学术研究只讲正面,不允许反面,学术问题只许一种看法,一种答案,发生分歧往往由党裁决。政治干预学术,导致了学术政治化倾向。

1. 建国17年的沉闷期。基本保持彻底批判否定儒学立场、以马克思主义取代孔子儒学的态度,朱子文学研究处于十分冷落沉寂的阶段。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但朱子学并未因此而解冻。经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对梁漱溟的批判(1953),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使学术界对传统学术望而生畏。1957年又开展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反右运动,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双百”变成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研究的一家争鸣。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去研究朱子理学,是需要勇气的。一些学者研究传统学术的著作出版时,往往在序言中先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马列学得不够,旧观点未能廓清,即可见一斑。

1957年,朱东润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指出“道学家不屑措意文辞”,“至朱子而略异”,又言其“议永叔、东坡之失,其言极深刻”。1958年,罗根泽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列理学派诗文道流说为一章,肯定朱熹的贡献——道文一贯说,并就说出的诗文与做出的诗文等五方面作了论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中国文学资料丛刊》,选编了朱熹《论白居易》。1959年6月,《文汇报》报导了“北京发现孤本宋版朱注楚辞”的消息,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佚名文章《宋版朱注楚辞》。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收录了朱熹《论陶渊明》。1964年以来,陆续编辑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整理收录了朱熹《论杜甫》及论柳宗元、黄庭坚、陈师道、潘大临、洪刍、吕本中、陈与义等语录体资料。1965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全宋词》,收录了《晦庵词》。这一时期的理论文章只有华山《程朱学批判》,分发于《山东大学学报》和《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上。

2. 10年浩劫批判期。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对传统文化和朱子理学的批判与否定达到顶峰。红卫兵捣毁孔家店,烧毁儒家典籍和古籍书画,砸碎碑刻联匾,一切传统之物都被看作“四旧”遭到毁灭。1973年,兴起声势浩大的“评法批儒”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由批孔儒而株连朱子,至1974、1975两年,猛然兴起批朱之热,近百篇批判论文在各报刊发表,其内容可概括为4方面:(1)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新江西大学学报》发表署名文章:《朱熹理学的要害在于克己复礼》;《人民日报》发表佚名文章《程朱理学是吃人哲学》;《辽宁大学学报》发表署名文章《朱熹的理学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动哲学》。(2)对朱熹行为的批判。在朱熹活动过的地区,如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湖南,都纷纷撰写文章,揭露朱熹在各地的“罪恶活动”和“反动嘴脸”。(3)对朱熹陈亮论辩的批判。1974年3月,《郑州大学学报》发表校大批判组文章《陈亮反对朱熹的斗争——南宋前期的一场儒法论战》后,紧接着,福建师大、浙江师院、



广东师院、江西大学、文汇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天津日报、河南日报等都发表类似文章,评析陈亮对朱熹投降主义哲学的批判。(4)把朱熹待人之道联系林彪的批判。先是《吉林师大学报》发表《林彪鼓吹朱熹待人之道的要害是复礼》一文,随后,《光明日报》发表《伪君子朱熹和两面派林彪》,《人民日报》发表《朱熹的待人哲学与林彪的复辟诡计》两文章,随之各报刊继相仿效。这时期文学研究只有两篇文章,一是王守华《问题唱出异调 新声胜过旧声——评陈亮朱熹的两首咏梅诗》^[9],二是司苑《朱熹诗四首批注》^[10]。

就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还处在意识形态禁锢时期,在香港和台湾,新儒家学派关于儒学、朱子学研究的成果却不断涌现,文学研究也成果颇丰。1968年,张健先后发表了论《朱熹的诗》、《朱熹的诗论》、《朱熹的文论》等文章,1969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1971年以来,钱穆《朱子新学案》由三民书局出版,其中有两章专论《朱子之文学》及《朱子韩文考异》。香港新亚书院学术年刊发表了杨勇《朱子论韩愈文之气势》、《朱子论韩愈文之文理》等文章。而日本的朱子学研究达到了鼎盛阶段。

(三)全面发展时期(1979年至今)。这一阶段仍可分两个时期:前10年拨乱反正时期,后18年逐渐成为显学时期。1978年8月12日,华国锋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二年这一天,《光明日报》发表庞朴《孔子思想的再评价》长篇论文,沉寂之中炸响一声春雷,冲开孔子儒学研究禁区的大门。

1. 十年拨乱反正期。1978年12月,中央11届3中全会召开,开始认真纠正文革“左”倾错误,批评“两个凡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有学者指出,1980年代,是朱子学研究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称之为“国际朱子学”的时代^[11]。这一时代的标志不仅体现于台湾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和旅美学者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两书的出版、以及夏威夷大学“国际朱子学会议”的召开,更主要体现在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

理学史》二卷和陈来《朱熹哲学研究》的出版、中华书局“理学丛书”的推出、厦门大学朱子学国际会议的召开、以及上饶师院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作的《朱子学刊》的创刊。

拨乱反正的步履是缓慢的。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曲阜师院联合发起全国孔子学术讨论会,张岱年先生在会上说:“尊孔的时代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本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孔子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此提法让人耳目一新。1982年10月,浙江省社科院举办宋明理学研讨会。1987年12月,厦门大学举办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华孔子学会成立两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张岱年提出“综合创新论”。1989年,国际儒联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张岱年在闭幕词中说:“我们应该创造新文化,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要超越传统,比传统高明。可首先要理解传统,瞭解传统是怎么回事,哪些传统应该批判,哪些传统应该继承。”指明了文化研究正确的态度。江泽民主席接见参会的部分中外学者,作了重要讲话:“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我国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教育我们的后代很好地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为文化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这次会在全国影响很大,标志着朱子学科学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全国各地从大专院校到科研院所,迅速掀起了持续的“文化热”。

禁区一旦打开,朱熹的文学研究便有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在研究队伍在扩大、范围在拓展、理论在深入等方面。如果说,夏威夷朱子会议还无文学的涉及,那么,从厦门大学朱子会议起,朱熹的文学研究便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从成果数量言,几年间论文达一百多篇;从研究范围而言,除了朱熹的诗经学、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继续深入发展,还扩大到朱熹楚辞学、诗论、创作论、文道观、文气论、诗文作品等多方面。如1979年,成复旺发表了《试论朱熹对文与道关系的看法》^[12]。1982年,有林维纯的《略论朱熹注楚辞》^[13]。1983年,黄坤发表了《朱熹的文学观》^[14],次年又发表《朱熹谈创作和创作修养》,



又在《文史知识》发表《朱熹的滋味说》。莫砺锋发表了《朱熹楚辞学略说》^[15]。1987年,张立文发表了《朱子美学思想剖析》^[16]。朱熹的诗文作品开始被重视,邱汉生发表了《论朱熹的斋居感兴诗》,霍松林先生在1984至1987年间,连续发表了四篇鉴赏文章。1989年,缪钺发表了《宋词与理学家——兼论朱熹诗词》^[17],认为朱熹诗“绝大多数是具有诗的意境韵味的,并且有少数诗特别精彩”,成就“在其他作诗的理论家之上”。胡明发表《关于朱熹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指出“朱熹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有一致之处”,“是从学选体起步的”等等。

2. 全面深入发展时期。1990年以后至今,朱子学逐渐成为显学,朱熹文学研究向深度广度大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学术界普遍认识到,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宋明理学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理学对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都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研究之盛表现在四个方面:

(1) 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不仅从朱熹的经学、哲学、伦理学扩大到文学、史学、教育学、美学、文献学、校勘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而且,仅以文学论,也由朱熹的诗经学、文学批评方面扩大到文道观、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以及作家论、文体论、文势论、文气论、艺术论、风格论、鉴赏论等多方面。对朱熹文学研究的三大著作——《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束景南的《朱子大传》,把朱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后期代表,放到多维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是一部精心撰写的佳著”(张岱年序)。吴长庚的《朱熹文学思想论》,把朱熹文学思想分为三层次论述,即文道论层次,文体论、文势论、风格论、诗论、文论层次,作品论的比兴、情感、形象,创作论的感物、积学、法度等层次,并就此作了“系统而精到的论述”(张立文序)。潘立勇的《朱子理学美学》,运用现代美学理论,从一个新角度对朱子理学文学思想做了深入分析。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对朱熹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朱熹的诗经学、楚辞学、韩文考异

均作了专章论述,又连续发表了《论朱熹的散文创作》、《论朱熹的文学史观》等多篇论文,具有重大的学术影响。这一阶段还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涉及朱子文学研究的各方面。

(2)大大完善资料建设。四川大学古籍所郭齐、尹波整理了《朱文公文集》,出版时更名《朱熹集》。华东师大古籍所朱杰人、严佐之主持完成了1800万字的《朱子全书》的整理出版,这是搜集保留最完整的朱熹著作。朱熹在福建各地的题刻行踪,也经高令印收集整理,著为《朱熹事迹考》^[18]。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将朱熹的书法手稿整理出版,各地陆续发现朱氏家谱、朱熹佚文等史料,束景南作了大量考证,集为《朱熹佚文考》。上饶师院朱子学研究所创建了朱子学研究网站,正致力于朱子学研究大型数据库建设。

(3)研究机构和队伍扩大。90年代以后,各地建立了各级各类研究机构和群众团体。在福建、江西、安徽、广西、广东、浙江、江苏等省,都成立了包含省到地市级的朱熹研究会,创办了《朱子学刊》、《朱子研究》等刊物。一些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都把朱子学、宋明理学列为方向,指导硕士、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华东师大朱杰人指导戴从喜撰写了《朱熹与文献整理》。浙江大学束景南指导包丽虹完成了《朱熹诗集传文献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曾志华指导侯长生完成了《朱熹山水诗的渊源与嬗变》^[19],等等。

(4)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出现一批优秀的文学研究专著。继《朱子大传》、《朱熹文学思想论》、《朱子理学美学》及《朱熹文学研究》出版之后。一些研究朱熹的专著或研究宋代文学的专著,都开始关注朱熹等道学家的文学,都在自己的论著中写进了朱熹文学研究的章节,如1994年张立文修订1981年版《朱熹思想研究》,增加了朱熹《美善、文道、诗理的美学思想》等三章。1995年,张毅出版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在第五章中也专门介绍了朱熹及理学家的文学思想。2000年,蔡方鹿出版《朱熹与中国文化》,也有专章研究《朱熹的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2001年许总主编的《理学文艺史纲》出版,综合